

★ 阅 览

马君武文选

M A J U N W U W E N X U A N

广西现代文化名人学术著述精选

曾德珪

选编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君武文选 / 曾德珪选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

ISBN 7-5633-2961-7

I. 马… II. 曾… III. 马君武-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551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电子信箱:pressz@public.gpptt.gx.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柳州市罗池路 13 号 邮政编码:545001)

开本:850 mm × 1 168 mm 1/32

印张:12.375 字数:315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3 000 定价: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粤海之西,自清以来,堪称人文鼎盛。清季桐城文、常州词传入,生根发芽,结为硕果。自此颇有驰向中原,夺席经筵者。迨至现代,广西文化名人辈出,经史词章、教育文化,弥不专精有成,可谓根深而叶茂,由此铸成广西现代学术文化之鼎彝,蔚为大观。

面对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作为广西唯一一家大学出版社,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地方文化的弘扬与建设,付出一份应有的努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出版这套《广西现代文化名人学术著述精选》丛书,选取了马君武、雷沛鸿、梁漱溟、王力、冯振、罗尔纲六位学者,萃选其学术精华,力求以有限的篇幅,呈示其学术全貌,以禔于后学。六人均是现代中国文化界一流的学人。其影响所及,不唯广西,也不唯中国,而是播及于海外。这种影响的深远性,也不止于当代,而是必将传诸后世的。其中,王力在汉语研究领域的贡献,梁漱溟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精思,罗尔纲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追探,均为世之翘楚,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等之,马君武飞扬的文才,雷沛鸿教育学上的建树,冯振于辞章间的深悟,亦非同凡响,各领风骚。

现代广西文化名人很多,我们选取这六人,是考虑到他们的影响和所涉及学术文化领域的广泛性。选编者也是在专业领域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我们相信,以他们的专业素养,必定有独到眼光,博取约成,订为一编,使这套书成为既有代表性又有较高学术性的各家选本。

近年出版界,对整理刊行近现代中国学术著述渐趋重视。这里面有史的因素,亦有地域因素。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以中国之幅员,有一方水土,必形成一方之文化。中国文化,便是这样四方汇聚而成的。广西地处南疆,近代以来,斯土大事迭起,斯民阅世亦眼界大开。这套丛书,或可使读者了解到广西现代学人的学术境界与襟抱,因此而更深于与广西的精神沟通。倘能如此,我们就知足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春于桂林

目 录

1/选编说明

3/前言

序跋

46/《法兰西今世史》译序

48/《竞业旬报》序

50/《威廉退尔》译言

51/《绿城歌客》译言

52/《德华字典》序

53/《卢骚民约论》序

54/《达尔文物种原始》译序

56/《赫克尔一元哲学》译序

58/《交通政策》译序

59/《商业政策》译序

61/《达尔文》序

学说

63/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
之学说

66/新派生物学(即天演学)家小史

72/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

81/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
严界观

- 86/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
党巨子所著书记)
- 96/弥勒约翰之学说
- 113/社会党巨子加菩提之《意加尼亚
旅行》
- 120/帝民说
- 124/圣西门(一作西士门)之生活及
其学说(佛礼儿之学说附)
- 131/论理学之重要及其效用
- 138/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
- 149/赫克尔之《一元哲学》

论述

- 171/论赋税
- 177/创造文明之国民论
- 182/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
其救治之法
- 189/论公德
- 199/民食问题
- 204/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在文治
大学之演讲)
- 206/论战争为人口增多生产缺乏之
结果
- 209/《失业人及贫民救济政策》总论

211/清代铁路事业

233/战争知识和战争精神

史传

236/女士张竹君传

239/民权自由之敌奥太利宰相梅特
涅传

258/世界第一爱国者法兰西共和国
建造者甘必大传

264/世界大发明家罗伯儿传(世界上
最强炸药之发明者)

273/世界大发明家卑司麦亨利传(速
制钢之发明者)

281/谢无量

283/移居窠恩(Down)以后的达尔文

提案

297/恢复地方自治机关议案

298/反对宪法草案第十九条第二项
定孔教为国教之意见书

函电

303/为反对对德绝交加入协约国致
各省通电

305/反对与德绝交加入协约国再致

各省通电

307/复张绍曾电

演讲

309/学术通论

——在上海虹口澄衷中学演讲

311/就北京法权会议答记者问(惩治
盗匪法决废除 未完法典只
提草案)

313/柏林大学立校的真精神

——民国 21 年 12 月 26 日在西
大纪念周演讲

317/走上俄罗斯的路

——民国 22 年 1 月 9 日在西大
纪念周演讲

322/来读一读亡国惨史

——节录自 22 年 2 月 27 日演
讲的《在这严重时期我们应
有的认识》一文

325/中国的人心与文明在什么地方

——民国 22 年 3 月 27 日在西
大纪念周演讲330/从旅顺陷落说到日本帝国的命
运

——民国 22 年 4 月 24 日在西

大纪念周演讲

336/民族文化与民族复兴

——民国 22 年 5 月 8 日在南宁
军校演讲

341/建设广西与基础教育

——民国 27 年 10 月 1 日在桂
林县基础学校教职员暑期
讲习会演讲

附 录

346/马君武生平主要活动年表

371/马君武主要著译年表

选编说明

一、本书分“序跋”、“学说”、“论述”、“史传”、“提案”、“函电”、“演讲”等7个部分。“学说”以介绍西方新学为主，故从“论述”中抽出，单独另列，为本书之重点。各部分篇什，均以时间先后为序。

二、本书所辑以单篇论撰为主，成书专著，择其重要者节选其中之一章或一节，以见一斑。凡入选之作，以具有学术价值者为主。译著、纯自然科学撰述、文学翻译、诗歌创作等不入选。附录只录其生平主要活动年表及著译年表两种，其余有关研究马君武的各种论述文字，卷帙浩繁，为篇幅所限，只得割爱。

三、本书所辑各文，均重新加标点，原有标点，一律不用；文字全部由繁体改为简体，直排改为横排。篇什出处及刊刻或写作时间于注释中注明。

四、本书所选各文，视其需要，用脚注略加简注，注释以古今译名不同者为主，而且仅限于篇中重要人物。作者原注一律在文中用小字注明。原文错字以〔〕号标出，脱字以〈〉号标出，衍文以[]号标出。原文未完，于篇末注明。原文引用外文错讹之处，径行改正，不另注出。

五、本书所选各文，有一稿而在不同时间、不同期刊发表者；有一书而经多次修改、多次印刷者，则一律以重新修订后刊出者为准。

六、本集附录所列马君武生平主要活动年表，意在为研究马君武先生之生平、思想及学术成就者提供基本线索，或为将来编撰《马君武先生年谱》暂定一个粗略的大纲。历年以来，研究马君武之生平事迹及学

术思想者不少。众多文字,各记所闻,各抒所见,时有矛盾,容或间有差谬(按:此事不足为怪。居正所撰《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碑铭》将马君武赴新加坡谒见康有一事系于君武入粤之后、莅沪之前,作“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显然有误;又,《马君武诗稿·自序》谓其入广西体用学堂为“十七岁”,以虚岁计为1897年,以周岁计为1898年。查《清实录》、《广西一览》,广西体用学堂之设,实为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邓家彦则明谓此事在“戊戌政变之翌年”。自叙之文尚且有误,遑论其他)。故非广事搜罗、详加考窍,难以成事。本集所附活动年表,非为避难就易,实为材料不足,力不从心所致。

七、本集附录所列主要著译年表,意在为马君武编一著译目录,以供研究者参考。系年仅以所见或可考者为限。尚未得见或著译年代暂不可考者,一律置诸表后。马君武生平撰述或著译以在日本和上海刊载或出版者为最多。在日本刊出者多为早期作品,距今已近百年,且在异域;上海当时为我国引进西方文化比较集中之地,期刊、报纸甚多。印刷发行图书的书局、书店亦不少。自民国以来,上海亦累经战火。马君武生前未必有意收藏自己所作诗文(观其自编诗稿,亦有疏漏可知),即有收藏,亦可能损失于1922年贵县蒙难一役中。凡此种种皆对我们今日搜集先生遗著造成巨大困难。此处所录,仅为马君武先生遗著之大部,决非全部。尚祈海内通家,惠予补充订正。

八、1984年我国台湾编辑出版《马君武先生文集》,其中披露所存若干原件,弥足珍贵。本集在编辑中曾部分采纳或以之为校勘原件,谨此致谢。

九、1991年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莫世祥先生所编《马君武集》,实为《马君武选集》,所录诗文,均截至1919年为止。但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亦非搜集无遗。不过就译撰部分而言,与台湾出版之《马君武先生文集》相较,已大有进步,不但数量已大为增加,且为其引用外文而作之注释,颇为不俗。本集在选编中曾以该书作为主要参考资料,其对外文之注释部分已经采用。为此当一并致谢。

前 言

一、马君武的生平

马君武(1881—1940),原名和,字贵公,又字君武,广西桂林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杰出的教育家和学者、卓越的翻译家和爱国诗人。

马君武生活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其间经过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运动、反军阀斗争和抗日战争爆发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所有这些重大的社会历史变革中,马君武始终站在民族民主革命势力的一边,从未动摇,从未退缩,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大无畏气质。

马君武出身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一个封建小知识分子家庭。早年接受的仍是中国传统的儒学教育,受过宋明理学的熏陶,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和历史等都有较好的修养,这为他以后从学术思想上评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优越的条

件。

马君武的生平,大略可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约从 1898 ~ 1905 年,为开始接受新学思潮和留学日本的时期。

1894 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随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运动便逐步开展起来,他们举起“救亡图存”的旗帜,号召抵制外来侵略,主张吸取西方新学,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实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因为受到清政府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只在 1898 年实现“百日维新”之后很快遭到失败。以后经过了义和团运动的被镇压、八国联军的攻入北京等一系列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在资产阶级中下层中掀起一场新的爱国主义浪潮,酝酿进行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马君武在这个时期,因受上述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在思想上和政治态度上出现过两次大的变化:首先由一个儒学知识青年变成一个维新运动的积极追随者;紧接着又由一个维新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

促成第一次转变的契机是 1894 年和 1897 年,维新派巨子康有为的两度至桂林,虽然每次时间都不长,但通过他和一般人士的接触、交谈和他的演讲,使桂林那些埋首于八股制艺的知识分子,扩展了眼界,开拓了胸襟。当时的马君武由于年资太浅,无法列入康氏门墙;但康有为在桂林撒下的维新种子,却使他有了间接接受维新思想影响的机会。

正是在这种维新风气的推动下,1899 年,广西境内第一所半现代化的新式学校——广西体用学堂出现于桂林。马君武成为该校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从此,他开始接受“儒学”以外的新学教育:修习英文及算学。

然而,把马君武卷入当时社会政治浪潮的则是 1900 年的“庚子事变”。当帝国主义的铁骑踏入北京,清帝蒙尘,国将不国的严重关头,使其激于民族义愤而有讥评朝政之“失”,从而迫使他离开广西体用学堂,

离开桂林,外出探求新知识。同时正是由于这一事变的冲激,才使他经由香港,专赴新加坡,向康有为“请教国是”,并许为康有为的“勤王”起义而奔走。事虽未成,但其不畏艰险的救国热忱,则为维新人士所称道。是马君武与维新派领袖人物直接接触之始。同样,也正是在这一事变的影响下,使逃避到西安的慈禧太后似乎也觉得有必要实行某种变革,以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了。就在清廷准备迁回北京的前数日曾下诏说:“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义和团档案史料》,1327~1328页)在清廷迁回北京后采取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改书院为学堂,并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这一来就引发了一个出国留学的热潮。此前,曾先后在广州丕崇书院和上海震旦学院修习过法语的马君武,就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得友人之助,于1901年冬赴日本留学。

马君武抵日后,初居横滨,与维新派著名人物梁启超过往甚密。自1902年起,连续为梁氏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期刊撰写诗文,作为维新派“引进新学思潮”、“开启民智”的宣传资料。在他早期所写的诗中,公开表露过其“勤王”保皇、尊君改制、变法图强的思想:“书生誓树勤王帜,铁屋瀛台救圣躬。”(《感怀二首》)“救亡党人志,改制圣君恩。”(《赠牖民二郎》)而对维新派的领袖人物表现出一种无限崇敬的心情:“中国少年公所造,末人千劫我何存?据鞍顾盼无余子,说法殷勤忆世尊。飞去帝旁与帝语,大同条段大乘门。”(《寄呈任公先生三首》录一)很显然,此时的马君武客观上已成为梁启超所领导的维新人物一分子了。

然而,随即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自1902年下半年开始,逐渐与梁启超疏远,至1903年8月以后,他与梁启超之间的个人来往完全中断,在政治上放弃了保皇维新的主张,毅然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促使马君武作出如此重大转变的,首要原因恐怕不会如某些研究者所说,是由于梁启超假托“羽衣女士”之名在《新小说》上刊出《东欧女豪杰》一文后,故意戏弄君武,造成马、梁交恶而引起,而应有其更重要

的政治原因。

首先,是1901年冬获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经过1895年和1900年广州、惠州起义失败的孙中山,其社会影响日渐扩大,在广大华侨和留学生中的威信日益提高。而其平易近人、勤于求知、富于理想的精神气质,更具魅力。所以一接触,君武就感到“万分兴奋”。

其次,受西方新学思潮的影响。在1902年至1903年间,马君武大量从事翻译或介绍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著作,原意是为维新派宣传“新民”学说、实现其改良主义的政治目的而服务的。而马君武则从中受到启示:西方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等学说是为资产阶级推翻残暴的封建专制统治而服务的,与维新派的保皇改制、实行君主立宪大相径庭,而与孙中山的“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革命理论,恰相吻合。所以,当他和孙中山接触之后,从孙中山的言谈中,他便认识到康、梁与孙中山的主要区别:“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人物也。”(邓家彦《故工学博士马君武少年轶事》,见《马君武先生纪念册》)当康、梁和孙中山的矛盾在1903年以后发展到无法调和的时候,他就只得做出舍弃康、梁而投身孙中山革命营垒的政治选择了。

再次,受留学生中爱国运动的影响。自1902年4月起,马君武接受孙中山的建议,移居东京秦力山处。秦原与唐才常在武汉曾奉康有为命组织自立军起义“勤王”,失败后流亡日本。这时已放弃保皇改制的主张,转而鼓吹“革命仇满”。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很容易接近。而在秦力山处又结识了许多有志于革命的中国留日学生。留学生中的一部分热血青年,由于接触到资产阶级的新学,由于感受到国家危亡的严重状况,觉悟到非进行一场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政权不可。1903年陈天华写了《猛回头》和《警世钟》,邹容写了《革命军》,这些都是我国留日学生大肆宣传革命的著名之作。同时也正在这时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书》,严厉驳斥了康有为的“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康著《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的荒唐论点,在留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时已形成对峙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间,观点各异,营垒分明,留学生中多数人都投向了革命派。所以马君武的这种选择也是当时留学生中的革命倾

向所促成。

最后,从实践中得来的启示。1902年3月19日,章太炎、秦力山等于东京发起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周年纪念会”,借纪念明亡于清的耻辱历史,鼓吹反清革命。我国留日学生报名参加者数百人。后被日本政府所阻。署名为赞助人的梁启超也惧祸退出。发起人名单中仅余马君武等10人。午后,孙中山邀请纪念会发起人及部分留日学生至横滨永乐楼补行纪念仪式。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与孙中山对留学生的爱国义举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使马君武加强了他与维新派决裂的决心。

以上种种,就是马君武与梁启超日渐疏远的主要原因。1903年8月以后,便完全断绝了联系。另一方面则奉孙中山之命在留学生中广泛联系,并参加了在孙中山指导之下而开展的留学生爱国运动。1905年7月,马君武与何香凝等四人在孙中山主持下,宣誓加入同盟会,为中国同盟会第一批会员。马君武、何香凝与稍后入盟的廖承志、朱执信等后来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何香凝《我的回忆》)。继而参加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同盟会成立筹备会议,与黄兴等6人被选为起草《中国同盟会章程》者。其中有一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8月20日,出席在日本东京赤坂区召开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孙中山在会上演讲后,“忽然有人提出质问,他问:‘我们是要排满革命,假如有满人要加入同盟会,我们怎么办?’一座为之哗然。……君武先生站起来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们是反对卖国亡国的满洲政府,如果满人中有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我们当然欢迎。’说完后,全体鼓掌,孙先生也鼓掌。”(李四光《追念马君武先生几件小故事》,见《马君武先生纪念册》)马君武的这番话简单明了地说明当时由孙中山领导,以中国同盟会为骨干的革命,实行的决不是狭隘的民族排满主义,而是以推翻卖国亡国的清政府、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共和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从此以后,马君武就紧随孙中山先生,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复兴中华民族,作为其毕生为之奋斗不已的目标。

第二个时期:自1907年~1916年,为参加辛亥革命和两次留学德国的时期。

马君武第一次留学德国为 1907 年春 ~ 1911 年秋,入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冶金;第二次留学德国为 1913 年秋 ~ 1916 年 5 月,入柏林农科大学,研修农业化学。1915 年 6 月,据传以《蚕丝七种元素之化学分析》一文,获柏林农科大学工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留德学生获工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马君武在两次留学德国期间,以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亲身所受的教育和在资本主义社会长期生活的各种经历,加深了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以及各种政治学说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为其传播西方“新学”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马君武在前后两次留学德国的间隙,即自 1911 年 11 月至 1913 年秋,为其在国内参加革命活动的时间。马君武第一次留德归来回抵上海之日,武昌起义已爆发 20 余日。他起初来往于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为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筹组临时政府而奔忙。同时,为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撰写社论、署名评论和杂谈等 10 余篇,为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和新政权建立后应采取的各项基本国策而出谋献策,为反对与袁世凯妥协和确立孙中山在临时政府中的领导地位而大造舆论(以上详见本文第三节所述),为建立民主共和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在中华民国未建立之前,马君武反对与袁世凯进行议和谈判;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他反对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但是,在革命阵营中,有相当一段时间,人们并未识破袁世凯的阴谋,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内都认为袁世凯有治理民国之才,“故余之推荐项城,并不谬误”(《总理全集》演讲丙,3 页)。直到 1913 年 3 月 20 日,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派人刺杀宋教仁后,孙中山才开始清醒过来。马君武则指出这是反动官僚摧残革命势力的一个信号,若任其所为,“民国将万无可望”。他还进一步指出:“今后之竞争,乃官僚与民党之竞争”,中华民国能否生存下去,“当视能否战胜官僚派为断”(《代表孙中山在上海各界举行的宋教仁追悼大会上致词》)。但是当孙中山提出要组织兵力声讨袁世凯,黄兴和其他领袖都不支持时,马君武则对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斗争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他一方面利用其国会议员的身份,团结了一批国民党议员,